

荷蘭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翁瑞廷

一、前 言

荷蘭是歐洲的小國，正式名稱是尼德蘭王國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俗稱荷蘭，是由於現有十一省中的二個省——Noord-Holland 和 Zuid-Holland 過去是歐洲政治核心的緣故。全國面積約四一、一六〇平方公里，人口目前約一四、〇二九、〇〇〇人。

荷蘭的政治是採議會式民主。目前由於北約部署核子飛彈的問題和內部經濟的不景氣，引起幾個大黨嚴重的爭議。荷蘭目前政局的動盪，可以由歷史的發展來說明。過去有人認為荷蘭政治體制的特色，是荷蘭內部具有勢力的宗派政黨表現了傳統主義和剛性 (rigidity)。這種說法描述一九五五年左右的荷蘭政治是相當合適，在一九六六年前這種說法也大致上是可信的。但在一九六七年以後，荷蘭的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化，大部分的政黨也發生了變革和適應的問題^①，宗派政黨的得票逐年下降，工黨及左派勢力逐漸擡頭。要分析荷蘭政治的穩定問題，我們就必須注意宗教性政黨的衰微，在荷蘭的多元政治體制下所顯示的意義。

一九五六年阿蒙 (Gabriel A. Almond) 把西方政治體系分成三類，即(一)英美政治體系，(二)大陸歐洲體系 (法、德、意)，(三)北歐和低地國^②。對於第三個範疇，他沒有冠以名稱，僅表示其具有英美政治體系和大陸歐洲體系的特色，阿蒙強調政治文化、社會結構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英美政治體系是同質、世俗的政治文化，具有高度區分化的角色結構，政府機構、政黨、利益團體、大眾傳播，各有其個別的專業功能而相互依存。大陸歐洲體系是分裂的政治文化，每一文化單獨構成個別的次體系角色。一般而言，英美政治體系的實際表現是穩定的，而大陸歐洲體系則是不穩定的。

註① Dr. P. Baehr, "The Netherlands" in Stanley Henig ed., *European Political Parties* (N. Y., Praeger, 1969).

註②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XVIII, (Aug. 1956), pp. 392-393.

依以上的分類，荷蘭是屬於第三個範疇，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有嚴重的種族、語言、文化、宗教、地域，甚或意識型態的分歧，這些頗類似大陸歐洲體系；但它又維持一穩定的民主政治，則又類似英美體系。像荷蘭這樣的民主國家，目前被稱作協合式的民主（Consociation democracy）^⑧。協合式民主的特色，可以從荷蘭每次選舉後，各政黨的領導者相互妥協的經過，表現出來。本文將從（一）各宗派政黨歷年得票的結果，分析荷蘭戰後民主政治的發展，及宗教性政黨的由盛而衰；（二）從去年大選後，各政黨妥協的過程，及從荷蘭協合式民主的運作，看宗教性政黨組閣的困難；（三）從荷蘭教會的活動，分析目前荷蘭的對外關係。

二、宗教政黨由盛而衰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支配荷蘭議會主要的五個政黨是正統嘉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 ARP）、溫和的新教的基督教歷史聯盟黨（Christian-Historical Union, CHU）、天主教人民黨（Catholic Peoples' Party, KVP）、社會主義的工黨（Labor Party, PvdA）、和自由主義的自由黨（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VVD）。所謂宗教性的政黨主要是指上述五黨中的反革命黨、基督教歷史聯盟黨和天主教人民黨。這些宗教性政黨曾經深深的影響着荷蘭的政治。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幾乎四十五年間，它們在每次大選中穩定的得到了五〇%左右的選票。但自一九六七年以後，這種情況開始轉變。三個宗教性政黨首先採取聯合陣線，以期在一九七七年選舉中獲勝，繼而組成一完整的政黨，稱之為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Appeal, CDA）。從後表可以看出宗教性政黨的得票率在一九六〇年代達到最高峯，過此便逐漸下降。一九四六——一九七二年間五個主要政黨在國會選舉中的得票情形如後^④：

%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〇年
%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〇年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宗教的吸引力逐漸衰退。荷蘭在一八五三年恢復天主教教會後，天主教人口增加三倍，而神職人員增加六倍。在一九七一年統計約有五百三十萬的天主教徒，約佔全部人口的四〇%，九七%的天主教徒訂閱教會的報紙。但這樣的日子已逐漸消逝。首先是神職人員的減少，據統計在一九六五——七五年大約有一、七〇〇位神職人員離職，而新任命的神父在一

註④ 最早使用協和式民主的學者是亞伯特（David E. Apter），*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Uganda: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1)。

註⑤ Herman Bakvis, "Electoral Stability and Electoral Change: The Case of Dutch Catholic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XIV: 3 (Sept. 1981), p. 523.

黨別	1946		1948		1952		1956		1959		1963		1967		1971		1972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	席次
天主教人民黨 (Catholic Peoples' Party, KVP)	30.8	32	31	32	28.7	30	31.7	49	31.6	49	31.9	50	26.5	42	21.9	35	17.7	27
反革命黨 (Anti-Revolutionary Party, ARP)	12.9	13	13.2	13	11.3	12	9.9	15	9.4	14	8.7	13	9.9	15	8.6	13	8.8	14
基督教歷史聯盟黨 (Christian Historical Union, CHU)	7.9	8	9.2	9	8.9	9	8.4	13	8.1	12	8.6	13	8.1	12	6.3	10	4.8	7
工黨 (Labor Party, PVDA)	28.3	29	25.6	27	29	30	32.7	50	30.3	48	28	43	23.5	37	24.7	39	27.6	43
自由黨 (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VVD)	6.4	6	7.9	8	8.8	9	8.8	13	12.2	19	10.3	16	10.7	17	10.4	16	14.4	22

九六〇年代却只有三一八人，在一九七〇年代只有十六位。荷蘭天主教徒參加主日彌撒的人數也逐年降低，一九六一年估計約有七〇——七五%的天主教徒參加主日彌撒，一九八〇年下降至二六%^{註⑥}，一九八一年下降至二三·七%^{註⑦}。至於天主教徒在選舉中對天主教人民黨的支持，也有逐年減弱的現象，左表所列，可資證明^{註⑧}。

項 目	一九五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經常參加彌撒而投票給天主教人民黨	九〇	七七	七〇	五三
不經常參加彌撒而投票給天主教人民黨	四五	三七	二五	二五
全部天主教徒投票給天主教人民黨	八五	六七	五一	三八
接受調查的總人數	未詳	一、二二二	五四四	六〇二

註：表列數字均為百分比。

另外一個原因是荷蘭天主教的分裂。自一九六〇年代中葉以來，天主教在荷蘭實施前進改革，讓已婚的神職人員繼續擔任神職工作，或在神學院教書。這二種方式都為羅馬教宗和荷蘭保守派主教所反對。一九八〇年一月教宗若望保祿（Pope John Paul）曾召開荷蘭天主教會議，希望緩和兩位保守派主教和其他四位被視為溫和和自由派主教間的爭執，要求他們彼此合作，以避免相互傷害。教宗選擇荷蘭為反擊天主教改革潮流的對象，這種作法並未為自由派的教徒所接受。他們認為民主化和自由的過程是必需的改革，而存在於教會上層的爭執是無關緊要的。此次教宗

註⑥ "Dutch Catholics Tending the Flock," *Economist*, Jan. 19, 1980.

註⑦ Richard Murphy, "Dutch bishops and church divided," *Hongkong Standard*, Feb. 2, 1982.

註⑧ Herman Bakvis, *op. cit.*, p. 549.

雖然出面，但爭執仍未平息。已婚的神職人員仍然繼續在某些教會工作。另外的爭執，是和其他基督教會的接觸問題，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則主張只有在教宗的同意範圍內，才可進行接觸^⑥。

爲了挽回宗教性政黨逐漸下降的議會力量，最先在一九六七年，三黨（反革命黨、天主教人民黨和基督教歷史聯盟黨）曾經討論組黨事宜，但因反革命黨、天主教人民黨隨後加入了工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而作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他們終於共同組織一選舉聯合陣線，稱作基督教民主黨，但這個黨當時仍只是一個選舉聯盟。一九七七年五月他們在天主教人民黨范阿德（Andreas van Agt）的領導下，提出共同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結果極爲不利，淪爲第二大黨，但仍組成政府。直到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三黨在海牙舉行共同大會，才決定把這個選舉聯盟正式變爲一個完全的政黨，並且選出布克曼（Piet Bukman，以前屬反革命黨）擔任主席，而由過去的選舉聯盟主席史汀坎伯教授（Piet Steenkamp）擔任名譽主席^⑦。宗教性政黨勢力的衰微，使得荷蘭的政治，逐漸有兩極化的傾向。

三、多元政治下宗教性政黨組閣的困難

荷蘭的多元文化社會，再加上它的選舉比例代表制，使得荷蘭產生了許多小黨，且每屆大選無一黨能得到絕對多數的議席。荷蘭每屆政府都需要長時間的談判才能組成，可是組成以後都頗爲穩定。據李哈特的看法，這是由於各種次文化的精英分子（elite）的行爲所造成。因爲這些精英分子了解缺乏政治共識產生分裂的危險，所以他們盡力協調分歧的次文化利益，並和相互競爭的其他次文化體系的精英分子共同努力，以發展適合荷蘭政治文化的穩定局面^⑧。我們將以一九八一年五月大選爲例，分析荷蘭的政治。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荷蘭舉行國會大選以後，基督教民主黨的范阿德原先領導的中右政府失去絕對多數，基督教民主黨損失一席剩下四十八席，自由黨損失兩席剩下二十六席，兩黨全部席次只有七十四席，距離絕對多數尚少二席，政府組閣面臨困難。後表卽是選舉的結果^⑨：

註⑥ Richard Murphy, *op. cit.*

註⑦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eb. 27, 1981, p. 30736.

註⑧ Arend Lijphart,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XXI, No. 2, Jan. 1969 pp. 207-225.

註⑨ Hans J. G. A. van Mierlo, "The 1981 Netherlands Elec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4 No. 3, Oct. 1981, p. 299.

黨	政	選舉年			
		1977		1981	
		得票百分比	席次	得票百分比	席次
基督教民主黨 (CDA)		31.9	49	30.8	48
工黨 (PVDA)		33.8	53	28.3	44
自由黨 (VVD)		18.0	28	17.3	26
急進政治黨 (PPR)		1.7	3	2.0	3
荷蘭共產黨 (CPN)		1.7	2	2.0	3
民主66黨 (D'66)		5.4	8	11.0	17
民主社會70黨 (DS'70)		0.7	1	0.6	0
國家改革黨 (SGP)		2.1	3	2.0	3
農民黨 (BP)		0.8	1	0.2	0
改革政治聯盟 (GPV)		1.0	1	0.8	1
和平社會主義黨 (PSP)		1.0	1	2.1	3
改革政治聯盟 (RDF)		—	—	1.2	2
荷蘭羅馬天主教黨 (RKPN)		0.4	0	—	—
其他		1.5	0	1.6	0

荷蘭的政治俗諺說：「誰打破聯合內閣，誰就必須付出代價。」一九七七年選舉的結果證實了這個說法。當時基督教民主黨的范阿德撤回對工黨烏義耳 (Joop den Uyl) 的支持，導致國會的改選，結果工黨增加了十個議席，而基督教民主黨只增加了一席。范阿德原先以為三黨（天主教人民黨、革命黨和基督教歷史聯盟黨）的聯合能挽救宗教性政黨的頹敗。但在一九七七年選舉結束以後，由於范阿德和烏義耳兩人的交惡，使得組閣異常困難，創下了荷蘭歷史上籌組新閣費時最多的新紀錄，共二〇七天，當時工黨和基督教民主黨及民主66黨曾經試組聯合內閣，經過了一七〇天的磋商，仍未達成協議；其後由基督教民主黨和自由黨進行磋商，也花費了三十七天才組成聯合政府。結果工黨雖贏得了多數但最後仍被排除新政府之外²⁰。

一九八一年的選舉結果顯示：左翼溫和政黨略有斬獲，尤其是民主66黨增加了九個議席。基督教民主黨雖然取代工黨而成爲

註²⁰ Ibid., p. 297.

最大的政黨，但如前所述，其聯合政府却失去了絕對多數議席，因此基督教民主黨有義務嘗試聯合工黨和民主66黨，以組成中左聯合政府。下面我們將從此次的談判過程，來分析荷蘭的政治精英分子對其政治穩定的貢獻。

選舉結果確定後，在五月二十九日，基督教民主黨、工黨和民主66黨首度集會。五月三十日，畢特里絲女皇（Queen Beatrix）任命基民黨黨員魯柏斯（Ruud Lubbers，一九七三——七七年曾任經濟部長）和柯寧（Jan de Koning，主管發展援助的不管部長），探求組成基督教民主黨、工黨和民主66黨聯合內閣的可能。談判工作在六月十一日開始，七月二十五日正式提出一些可能的妥協範圍：1. 延遲決定巡弋飛彈的部署及繼續使用核武力的問題；2. 至一九八五年以前要緩和個人收入的增加；3. 內閣的組成包括基督教民主黨六席（其中包含總理）、工黨六席、民主66黨三席。談判一開始，工黨和民主66黨首先反對由范阿德繼續擔任總理，而願以其他任何基督教民主黨人代替。范阿德和烏義耳之間的衝突原由前已述及。然而在荷蘭的政治特色下，個人的衝突雖然重要，但是為了政局的穩定，政治家終必捐棄成見採取妥協。七月八日工黨放棄反對范阿德擔任總理，以換取內閣重要位置。七月二十日，女皇加派錫仁（Ed van Thijn）參加磋商，在磋商中，爭議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北約決定最遲一九八三年開始在荷蘭部署四十八枚巡弋飛彈的問題。工黨完全反對新的飛彈部署，民主66黨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反對部署，基督教民主黨則贊成利用這些飛彈的部署，與蘇聯談判武器限制。三黨對此問題的立場，差異太大，故未能產生妥協。八月五日女王重新任命克雷莫（Sjeng Krenner，基督教民主黨），會同錫仁繼續進行磋商，但因基督教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在八月十九日以三十五票對十二票否決了一九八二年預算的妥協案，致組成政府事，功虧一簣。至此，女王另又任命福特門（William de Gaay Footman，基督教民主黨，一九七三——七七年內政部長）主持新的磋商，范阿德自己也暫時辭去基督教民主黨議會領袖的職位，親自參加協調。結果新的內閣在九月二日終於組成，九月十一日宣誓就職。新內閣把最燙手的飛彈部署問題延擱至下一屆政府再決定。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這問題在下屆內閣中將是一定時炸彈。但國防問題並不是唯一引起爭執的問題¹⁹。在財政問題上，他們也面臨了衝突。工黨想增加工作機會，來解決目前高達九·五%的失業率。在其四年的創造就業機會的預算中，他們希望有二億——十六億美元。基督教民主黨則以減少預算赤字為優先，因此反對工黨的計劃。民主66黨也和基督教民主黨的立場一致。在一九八二年預算中，基督教民主黨只同意給予一億六千萬美元，而工黨則要求四億零九百萬美元，工黨不滿而否決了這個方案，內閣正式破裂，十月十六日總理范阿德正式向女皇提出內閣總辭。女王要求范阿德繼續領導看守內閣，並在十月十九日任命兩位工黨的經濟學教授擔任調解工作，他們是萊登（Leiden）大學的豪勒伯斯塔（Victor Halberstadt）和哥寧根（Groeningen）大學的嘉蘭（Cornelis de Galan），二者都是政府的顧問機構——社會經濟委員會（Social-Economic Council）的委員。在他們的奔走協調下，十一月五日范阿德總理正式撤回總辭。妥協的結果是一九八二年預算中撥給二億八千七百萬美元作為解決就

業問題經費^⑭。社會經濟委員會是荷蘭的有關社會和經濟政策官方諮詢機構，創立於一九五〇年，其委員主要來自商業團體、工會和其他社會各階層；其主要功能是把主要的次文化體系精英分子的意見加以協調，以助政府釐訂政策^⑮。因此這個委員會也是造成荷蘭多元化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⑯。

荷蘭目前內閣的成員如下^⑰：

總理：范阿德，基督教民主黨，（一九七七年起擔任總理）。

副總理兼社會事務及就業（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部長：烏義耳（Joop den Uyl），工黨，（一九七三——七七年任總理）。

副總理兼經濟部長：拓洛（Jan Terlouw），民主66黨。

外交部長：斯托勒（Max van der Stoep），工黨（一九七三——七七年任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密爾羅（Hans van Mierlo），民主69黨，（黨創立之人及前任領袖）。

財政部長：史提（Alfons von der Stee），基督教民主黨，（一九八〇以後擔任財政部長和安提列斯（Antilles）事務部長）。

內政部長：錫仁（Ed van Thijn），工黨。

文化、休閒和社會服務部長：羅烏（Andre van der Louw），工黨。

司法部長：魯特（Job de Ruiter），基督教民主黨，（前鹿特丹市長和工黨主席）。

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id）部長，迪吉克（Cees van Dijk），基督教民主黨。

教育與科學部長：克美納德（Jos van Kemenade），工黨，（一九七三——七七年任教育與科學部長）。

農漁部長：柯寧（Jan de Koning），基督教民主黨，（前任政府不管部長，主要負責發展援助）。

健康與環境部長：瑪希達（Mathilda Gardeniers-Berendsen），女性，基督教民主黨，（在前屆政府擔任文化、休閒和社會服務部長）。

註⑭ *Facts on file*, Nov. 6, 1981, p. 822.

註⑮ Ronald, A. Kieve, "Pillars of Sand: A Marxist Critique of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 1981, pp. 327-328.

註⑯ Arend Lijphart, *op. cit.*, p. 214.

註⑰ Robert Schull, "Difficult decisions facing van Agt's new Dutch Cabinet," *The Times*, Sept. 11, 1981, p. 7.

運輸和水道部長：吉瓦金 (Henk Zeevalking) 民主66黨，(前任民主66黨主席)。

四、教會目前對政治的影響

教會雖然對宗教性政黨的支持逐漸降低，甚至教宗反對神職人員參與實際政治，但是荷蘭的教會對於目前荷蘭的政治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會間和平委員會」(Inter Church Peace Council, IVP) 的各項活動。這個委員會建立於一九六七年，至今已有一十六年歷史，所有荷蘭的主要教派都是成員，其中以荷蘭的改革教會 (Reformed Church) 最具勢力的支助，其中包括新教各派和羅馬天主教。它在全國共建立了四〇〇個教區分支機構，但其成員教會對其行動或言論並無遵循的責任，在越戰期間該委員會曾採取強烈的反美立場；在非洲它透過普世教協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打擊種族主義計劃」(Programme to Combat Racism, PCR)，支持非洲的解放運動。一九七七年它曾有效的發動反對中子彈運動，並獲得當時荷蘭一千四百萬總人口中一百二十萬人的簽名支持，聲勢大振。目前它是西歐和平運動的楷模，各國和平運動組織都向它學習^⑧。

一九七七年開始，「教會間和平委員會」採取了新的策略，提出了「要拯救世界免於核子武器的威脅，首先從荷蘭開始做！」的口號。此後，它每年發動「和平週」，要求「片面解除武裝」。它認為荷蘭先行減少核子武器，是世界減少核子武器的必然步驟。它也以為其所提「片面解除武裝」的建議將可降低西方對蘇聯的恐懼，進而導致相互裁軍。它批評西歐的整合，贊成東、西方的聯合，並期望在未來蘇聯能實際參與歐洲的事務。

「教會間和平委員會」是目前荷蘭政治上最重要的和平遊說人，它和工黨、和平社會主義黨、急進黨及某些基督教民主黨黨員有密切的關係。在國會中它成功的組成了反對國防政策的遊說團體，給荷蘭政府帶來了不少困難。以目前反核子武器運動而言，該委員會可說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宗教和政治性壓力團體。自一九八〇年以來，荷蘭新教採取了它的觀點，其他教會亦隨之跟進。這對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構成了極大的挑戰。上屆內閣的下臺，與部署飛彈問題的至今遲遲未能解決，實受其影響甚大。

「教會間和平委員會」對外的策略是宣傳「小權力政策」(Kleine landen politiek) 的觀念。依照這個觀念，荷蘭應該是小各國的指導國 (Gidsland)，藉着創造國際行爲的例子，而成爲世界其餘小國的前進指導，因此，它主張荷蘭應聯合其他的小國如丹麥、比利時、墨西哥等。它希望打破美蘇兩強的核心子保護和它們對其他小國在財經方面的支配。另外它也希望所有的小國

註⑧ J. A. Emerson Vermaat, *Neutralist tendencie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World Today*, Dec. 1981, p. 486-487.

能獨立於傳統與美蘇合作的國際組織之中，如北約、華沙公約、世界銀行等。它並不建議退出這些組織，僅希望迫使這些組織改革^{①9}。據「教會間和平委員會」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的調查顯示，有六〇%的人贊成移走目前設在荷蘭的六種核子武器體系，七三%的人宣稱贊成荷蘭繼續留在北約^{②0}。

「教會間和平委員會」並使其反核運動國際化。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它與西德的和平運動組織在波昂共同發動示威，反對北約部署新的核子飛彈（即五七二個巡弋和潘興二式飛彈在一九八三年以前開始部署於英國、比利時、西德、荷蘭和意大利之決議）。「教會間和平委員會」與其他國家的和平運動有密切連繫。一九八一年一月，荷蘭、比利時、丹麥和挪威的社會主義者曾在阿姆斯特丹集會，討論反對核子武器部署的問題。美國和西德所以重視此類會議，主要是怕反核子武器的示威可能造成的輿論風潮，而阻礙一九八三年以前部署新的核子飛彈。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一月間，西歐面臨了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最大的反戰示威。每逢週末，西歐主要國家的首都如波昂、羅馬、倫敦、阿姆斯特丹各地發生的示威，共計約有二百萬人參加。對這些和平運動者而言，這僅是開始。他們還計劃更進一步的活動。例如西德的共產黨爲了擴大這個運動，不惜聯合它一貫反對的非正統的新左派——保護環境主義者。這些新、舊左派共同草擬了「三年行動計劃」，以求在一九八三年阻止北約部署潘興二式和巡弋飛彈。

和平運動不但反美，也反俄。當然這類示威行動產生的衝擊並不平衡，因爲它們對西歐各政府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政治壓力，足以影響其執行北約部署飛彈的決心，而這類示威根本對蘇俄並未構成任何政治壓力。美國喬治城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雷克爾（Walter Laqueur）稱這種中立主義是荷蘭症（Hollanditis），指責荷蘭正領導着幾個小國走向中立主義的路徑上^{②1}。其實這種渴望和平的心理，不僅發生在西歐，在東歐亦會出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旬，東德境內八個地區的路德教會組織中，有五個召開了宗教會議，和平問題是會中的主要議題，接着羅馬尼亞總統西奧塞古兩度公開呼籲東西裁減部署在歐洲的長程核子武器，並且建議蘇聯撤除它現有的SS—120飛彈，以換取北約打消它未來部署新飛彈的決定。不過，蘇聯對於這類呼籲是不會予以理會的，對於鼓勵西歐境內之反核子運動，也是不會稍加抑制的。因爲這股運動愈擴大，到頭來對美國和西歐聯盟關係的不良影響，也會越大。因此有人指責和平運動的背後，有蘇聯的財力支助與煽動^{②2}。

五、目前荷蘭的對外關係

註^{①9} Ibid.

註^{②0} "Majority of Dutch Don't Want N-Weapon", *The Japan Times*, Mar. 21, 1981.

註^{②1} "Are the Dutch Leading a neutralist trend," *China Post*, Aug. 1981.

註^{②2} 「東歐人民反戰情緒高昂」，〔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

中立主義是荷蘭的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荷蘭保持中立，置身於戰爭之外。二次大戰由於德國需要荷蘭的機場發動空戰攻擊英國，德國遂入侵荷蘭。因此在二次大戰以後，荷蘭摒除了中立政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共同市場等國際組織。但是儘管如此，戰前的中立政策，仍使得荷蘭民衆對於外交事務比其他歐洲國家的國民更爲冷漠。他們較關心的僅是歐洲的整合問題。一般而言，荷蘭民衆現在對蘇聯的威脅已逐漸消失，當然他們也了解蘇聯入侵西歐時，荷蘭很難倖免。

荷蘭目前和我國沒有外交關係，它是最早承認中共的西方國家之一，和中共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但在獨立自主的外交傳統及現實主義與國家利益的引導下，荷蘭和我國的實質關係日益增強。荷蘭過去是商業國家，同時也曾因此而立其經濟殖民帝國。因此，荷蘭重視對外的貿易關係。以六十五（一九七六）年到六十七（一九七八）年爲例，我國與荷蘭貿易的總額分別是二一八、八二二、〇〇〇美元，二三四、四六六、〇〇〇美元，三三〇、八八一、〇〇〇美元；而同期荷蘭和中共的貿易則分別爲一二八、五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二六〇、五五〇、〇〇〇美元。由於我國貿易潛力遠較中共爲強，荷蘭乃堅定其立場而與我國增進經濟貿易關係，目前荷蘭已有兩家銀行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其一是荷蘭第二大銀行ABN (Algemene Bank Nederland) 屬下的荷蘭商業銀行 (HBU) 在臺北設立的分行，其二是荷蘭第三大銀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銀行一九八二年十月在臺北成立的安利 (Amro) 銀行聯絡辦事處。在一九八一年九月荷蘭在我國正式成立了荷蘭貿易促進會臺北辦事處。

在中荷貿易日益增進的時候，去年一月發生了國際間令人矚目的事件，即荷蘭政府不顧中共的強烈抗議，決定對我國出售兩艘潛艇。經濟需要是荷蘭堅持銷售潛艇的最重要理由。荷蘭目前經濟面臨困境，失業率高，再加上社會福利措施的重大負擔，使得荷蘭內閣急於謀求拓展海外市场以期解決問題。此次荷蘭政府授權售予我國潛艇的 RSV (Rijn-Schelde-Verolme) 造船廠，是荷蘭最大的造船廠，也做機械方面的工程，由於經濟不景氣，一直接受政府長期的補貼，使其員工免於失業的威脅。這筆四億六千萬美元的潛艇貿易，即可使該廠一千四百多名員工，在四年內可免於失業。因此當時的經濟部長阿爾丹那 (Gijs Van Aardenne) 傾全力支持此項交易。他認爲站在解決失業的觀點，這筆交易是值得做的。另一方面，曾經兩度訪問中共的荷蘭外交部長克勞 (Van der Klaauw) 則採取反對立場，他甚至以辭職來威脅政府放棄此項交易。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荷蘭國會以六票對七十四票，通過了荷蘭政府的決策，各黨投票的立場如下：當時執政的自由黨投贊成票，基督教民主黨大部分議員投贊成票，小部分反對；工黨及其他小黨投反對票^②。

中共因此惱羞成怒，立刻召回當時正在荷蘭訪問的中共「水利、港口建設代表團」，並取消即將出發的中共「藥學代表團」

註② 程雄，「荷蘭售我潛艇的來龍去脈」，〔中國時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第二版。

的訪問荷蘭。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九日中共又宣佈降低它與荷蘭的所謂外交關係——由大使級降為代辦級，並取消若干商業合約，尤其是中共與殼牌石油公司的合約。不過，荷蘭政府並未因受到中共的此種政治壓力而改變其對我國出售潛艇的決定，因為荷蘭政府在權衡我國與中共的經貿潛力之後，確認它的這一決定是正確的，也是有利的。

六、結 論

一九八一年是西歐各國繼一九七三—七四年石油危機之後最黯淡的一年，荷蘭也不例外。由於經濟不景氣，能源問題和國外的市場的強烈競爭，再加上失業人口日益增多，已使得荷蘭的財政失去平衡，並造成經濟成長停滯，物價大幅波動和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等惡性循環。同時高度的失業率更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公共支出受到限制，福利政策亦深受影響。

其次，戰後的歐洲新生的一代，逐漸有恐俄及反戰的心態。北約盟國要在一九八三年開始部署新的飛彈引起了反戰份子的示威。在這些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中，荷蘭却站在領導的地位。這不但影響了荷蘭自身政局的穩定，也損及北約組織的團結，削弱了西方國家抗拒蘇俄的力量。

在目前的情況下，財經和國防成爲政治上爭辯的主要問題，深深地影響荷蘭政府的穩定，也在考驗荷蘭的協和式民主在多元社會下的運作。荷蘭未來政局能否穩定，主要繫於日益窘迫的失業問題能否解決，和飛彈部署問題能否在各主要政黨間達成協議

